

舆论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与演变

倪琳

摘要：采用关键词句段提取与数据库统计方法，从四个层面考察舆论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与演变。首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舆论意义类型可划分为品评人物、朝堂之争、民心民意、方法建议。其次是用舆论替代清议的现代动因，指出皇权政治体制内的清议概念无法适应时代转型的需求；接下来是中国语境中的“舆论”与西方语境中的“public opinion”的字源对比，指出舆论观念的兴起适应于从传统皇权转向现代民主国家的时代需求，舆论概念的使用消减“公论”所携带的官方倾向与精英色彩；通过分析现代中国与西方舆论观念的异同，发现西方舆论思想在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对现代中国告别皇权专制、追求民族解放发挥了思想启蒙作用。然而，这种思想启蒙作用没有彻底完成，传统力量对西方舆论思想进行了“选择吸收与重新建构”。

关键词：舆论观念；舆论思想；现代中国；兴起；演变

作者简介：倪琳，女，副教授，文学博士。（上海商学院 东方财富传媒与管理学院，上海，200235）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4）03-0092-06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反复实践的观念史研究范式——对革命、民主、共和、权利、权力、自由等现代中国转型期所出现的众多政治术语采用关键词句段提取与数据库统计方法，^[1]本文试图将此类观念史研究范式应用到新闻传播思想中的舆论概念之中，主要从以下四个层面梳理现代中国舆论观念的思想结构：首先“舆论”一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意义类型，其次为什么要用“舆论”来翻译public opinion？再次，需分析中国和西方舆论观念的异同，最后揭示中国舆论观念形成与演变的意义逻辑。将“舆论”作为关键词的研究可以透视中国传统言论思想向现代转型的缩影，反映中国当代思想与现代传媒变革面临的困境。本文依据“晚清和民国全文期刊数据库”、《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中有关“舆论”一词的使用次数统计和意义转型分析，对四个层面的问题一一进行讨论，并从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经验与思想出发，分析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

一、舆论观念的传统结构

“舆论”由“舆”和“论”两个汉字组成，是一个偏正结构。从词源上考察，依据许慎的解释，古文“舆”字上为“车”，下为“八”。从舁(yu)声，舁有轿子之意。《辞海》中关于“舆人”有三个基本含义：（1）造车舆的工人。《考工记·舆人》：“舆人为车”。（2）众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3）古代职位低微的吏卒。《左传·昭公四年》：“舆人纳之，隶人藏之。”^[2]随着“舆”的长期使用与变化，第一种特指造车工匠的“舆人”逐渐隐退，“众人”、“地位低的人”这两层引申含义逐渐稳定，例如《说文解字》注释，舆者，众也。“论”（論）字是一个会意字，从以仑会意，从“曰”部。仑，思也，思如玉部，理也，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弟子之言谓之论语。《周易》中“君子以经论”，《中庸》“经论天下之大经”，皆谓言之有伦有脊者，这说明“论”中含有说理、判断之意。论者，议也，议者，语也，“舆”与“论”两个字的联用，可以推导出其意为众人的议论，同时也隐含某种众人言说所具有的一定正当性与合理性，其意义在某种

程度上接近西方“public opinion”的原意，即为多数人观点为基础的集体意见。

中国舆论学者一般认为,《三国志·王朗传》中“舆论”一词第一次出现,但舆论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通过二十五史数据库检索发现,共有 45 篇文献中使用“舆论”一词。关键词研究与数据库方法是指将过去所有文献的专业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文章和人物,而是句子。最重要的是根据句子及其上下文来区分关键词的意义类型。通过对收集到含有关键词的古代文献句子分析,“舆论”的意义类型可以分为:品评人物、朝堂之争、民心民意、方法建议。品评人物是指在选拔人才、考核官员过程中对人才、官员的好恶评价;朝堂之争是指皇帝、朝臣之间的政见之争,或者朝臣对皇帝所作所为的强烈反应;民心民意是指某项举措与决策来自并符合人民的意愿;方法建议是指在采取某种措施之前听取多方意见,收集多方看法。由于清史稿中的舆论观念渐含现代因子,如“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各省应有采取舆论之所,俾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东、西立宪各国,虽国体不同,法制各异,无不设立议院,使人民选举议员,代表舆论。是以上下之情通,睽隔之弊少。”(摘自《选举志八·新选举条》,《清史稿》卷一一三志第八八),对于舆论观念的传统结构源于二十四史文献。从表 1 可以看出四种意义类型及其举例。

表 1 二十四史中“舆论”的用法举隅

意义类型	文献例句及出处
品评人物	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宣宗》,《旧唐书》卷一八下 本纪第一八下) 观复令十四道御史论其诬妄,以是为舆论所鄙。(《刘观列传》,《明史》卷一五一,列传第三九) 皇上听一贯、鲤并去,舆论无不快一贯而惜鲤。(《姜士昌列传》,《明史》卷二三〇 列传第一一八)
朝堂之争	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世宗二》,《明史》卷一八,本纪第一八) 阶采舆论利便者,白而行之。(《徐阶列传》,《明史》卷二一三,列传第一〇一)
民心民意	设其傲狠,殊无人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王朗传》,《三国志》《魏书》卷一三,魏书第一三) 舆论不能夺,遂从其议,仍令同定本官四时祭祀仪及醮法。(《方技传上·楚芝兰传》,《宋史》卷四六一,列传第二二〇) 加以极刑,允合舆论。《顺帝纪三》《元史》卷四〇,本纪第四〇一时舆论莫不称允。(《奕赫抵雅尔丁传》,《元史》卷一三七 列传第二四) 且迎驾、复储之议不惬舆论,故冤死而民不思。(《王文列传》,《明史》卷一六八,列传第五六)
方法建议	爰询廷臣,博采舆论,金谓拯弊必合更张。(《食货志五·钞法条》,《元史》卷九七,志第四五下) 臣博采舆论,治河之策有四……(《河渠志一·黄河上条》,《明史》卷八三,志第五九) 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测岸以究水势之浅深,遍阅史籍,博采舆论……(《成遵传》,《元史》卷一八六,列传第七三)

二、舆论的兴起与清议的淡出

在传统中国,还有专门指代言论批评或建言评说的一种称谓,叫做“清议”。在中国古代,“清”象征着洁身自好,高明清醒,直言谏诤。在春秋战国时代,“清”字早就与德行、政治操行联系在一起,如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濯,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又如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清议作为一种建言评说的古代传统具有其独特的内涵,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即公正、廉洁的言说主题;洁净、纯洁的言说动机;高洁、高尚、高明的言说观点。王维江通过对范曄的《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记载推断出在大一统时代与建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清议”,不单是指言官词臣的谏讽,也包含在野士绅的评议,不同动机、不同政见交织在一起。^[3]因此,到明清朝代,包含各种建言评说的清议演变成为一个既有褒义又有贬义的称谓。含有褒义层面的清议是一种主动自取,一种独立态度,一种自我标榜,发挥监督朝政得失与朝臣品性的正面作用;贬义层面的清议是一种被动他称,排斥异己,含有“士大夫峻门户而重意

气”的讥讽嘲笑之意，沦为党争的工具。

更具特点的是，清议总会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政权面临统治危机的衰败时刻，往往会发挥一种“起敝振衰”的言论力量与道统力量，一群负有名望的，又不愿与把持朝政的权贵同流合污的士绅阶层用高声呐喊的道统理想作为舆论先声，推动每次政权危机的转换。例如顾炎武称，“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又如林语堂将汉朝的公众批判和党锢事件、南宋太学生爱国学潮、明代东林党运动称为中国清议传统的三次高潮。^[4]每次清议高潮都出现在社会政治危机最为深重之时。然而，有着如此深厚历史渊源的清议传统却从现代中国话语中淡出，并逐渐被舆论所取代。如今，舆论已经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跨文本语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决策。执政党的施政纲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政治家的演讲、学术研究的论作、组织的公关活动、普通人的日常交谈，我们都会频繁地看到、听到或者说到这个语词。为了更好地从深层结构说明清议与舆论之间的替代变更关系，本文试图考察二十五史数据库与晚清民国全文报刊数据库中的文献数据，从而了解舆论、清议在不同历史传统背景下的经验依据。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清议在中国古代的使用次数明显高于舆论，在宋明时期（宋史出现21次，明史出现30次），清议的使用达到高峰，其次清史稿出现14次，处于第三使用高峰。相比之下，舆论在清史稿之前史书中有所存在，其意义结构中的“品评人物”、“朝堂之争”和清议的内涵有相似之处，但使用频率并不高，直到晚清时期才开始呈现活跃趋势。相比之下，从图2我们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清议进入晚清民国之后，完全不敌舆论的使用次数，除1898—1902年清议使用次数由于维新派创办《清议报》、《知新报》，维新士大夫将传统清议类比于现代报刊舆论活动，此阶段数据库中所出的清议字段频率高达6192次，接下来是抗战结束后清议概念又被短暂地唤起，但与舆论相比，20世纪以降，清议基本上淡出人们使用的视野，被完全边缘化。舆论则从1898年这个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转折点开始，它的使用就一直高居不下，三四十年代使用相当频繁与集中，例如1933—1937年1818次，1943—1949年1588次，其态势完全是已经将清议替代，成为现代中国人言论表达，意见评说的日常性专有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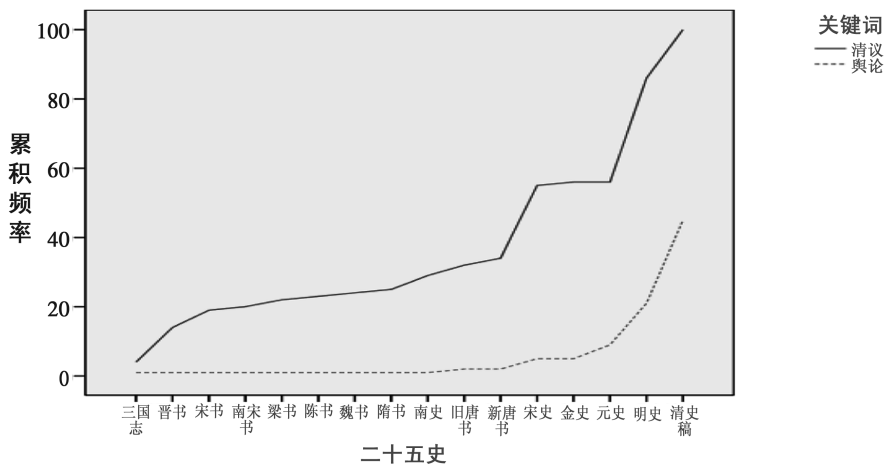


图1 舆论、清议在二十五史中的使用次数

统计数据表明，舆论观念的兴起与清议的淡出是现代中国不争事实。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清议毕竟从属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以及专制皇权统治的政治体系之下，无法容纳与适用于新的来自于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权理论。第二，清议从本质上属于在朝官员内部的政见竞争与利益角逐，这种政治性批评具有谏议的体制内色彩，言论范围与意见表达领域过于褊狭，依附于王朝体制之内的极其有限的言论自由，最终代表的还是统治集团利益分配诉求。第三，科举制废除之后，儒学与普遍王权结合的制度性渠道崩解，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士”的社会角色发生“位移”，从庙堂上的直接辅佐君主转移到社会层面的“处士横议”，诉求的视野不再仅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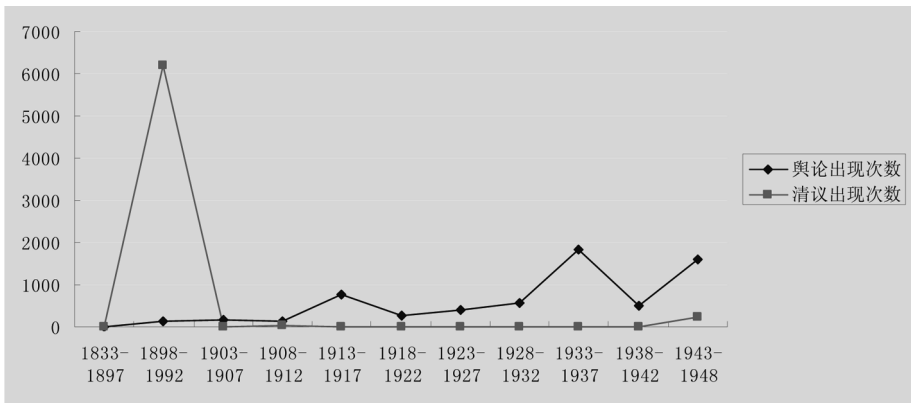


图 2 舆论、清议的使用次数（1833—1949 年）

聚焦在君主身上，而是向社会传播与民众扩散。第四，现代大众媒体扮演了新的言说工具，扩充了传统的言说渠道与方式，与此同时，逐渐崛起与上升的资本主义新兴阶层在影响社会、改变社会方面有着很强的表达欲望与表达冲动，使得皇权政治体制内的代表士大夫言论特点的清议概念无法适应时代转型的需求。^[5]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框架下的清议概念在剧烈的时代转型的背景条件下不得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舆论这个更平民、更底层、适用范围更广的概念所代替，完成以人民大众作为表达意见的言说主体的具有现代化思想内涵意味的演变。

三、为何用“舆论”译 public opinion

翻译从来都不是不同文字之间的机械性复制与对等式转换，每一个概念的兴起与流传通常要适用于所处的时代、思想、政治的需求的同时，每一种翻译还需要经过语言转换后在新的文化环境中获得新生与再创造。英语的 public opinion 由两个单词组成，我们很容易直接译出“公共的意见”，这与中文中的“公论”最为接近，然而，在现实的翻译处理中，人们更有意识地使用“舆论”对应于 public opinion。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翻译问题，并对此做出解释，一般持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舆”论与“公”论是同一的，可以互换的。例如，陈固廷认为，“舆论一语，原来是英文 public opinion 的译语，原文意义本来是‘公论’，其所以称为舆论的理由，或许以舆论代表多数，更比‘公’来得鲜明，而且在一般人已经成了一个习惯的名词的缘故吧”？^[6]第二种则认为舆论与公论虽不尽相同，但有部分重叠之处，徐道鄰认为，“舆论之往往被认作公论，因为两者同是超然。舆论之有时不能代表公论，因为舆论不能深知”。^[7]第三种认为公论与舆论是不同的，完全不能混淆在一起的。例如，黄钟认为，“然则舆论不足为公论乎？则对曰：不能，且万不可以舆论为公论。盖舆论之言，众也，非公也”。^[8]可以看出，公论与舆论既有部分相同，也不相同，而且“不同”要多于“同”。

之所以出现如此有趣的翻译，取决于“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重要的概念。学者陈弱水、沟口雄三对“公”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强调“公”最为原始的意涵是朝廷、政府或国家。例如周法高《金文诂林》中，认为甲骨文、金文中的“公”主要有祖先、尊长、国君等义。《尚书》中的“公”，几乎都是专有名词，如代指周公、召公，但有两例系泛指诸侯。^[9]“公”即是周代封爵之首：“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礼记·王制》），“公”同时也是古代朝中最高官位的通称，“三公”即是最尊贵的三个官职的合称。

从《诗经》中，我们发现“公”的含义更为广泛，除了指封建诸侯、贵族领主，也及于与这些统治者有关的事物，例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夙夜在公”，“敬尔在公”（《周颂·臣工》），“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诗经》中的“公”，意思都越来越具体，单独出现时，多指封建主（包括周王）的官署或宗族。由于封建主的官署里主要用于处理政事，所以“公”于

是也开始出现公务之义,如“敬尔在公”。^[9]

至春秋晚期,“公”则开始有了明确的政府事务、一般政务、公众事务的意思。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概念,“公”最初的含义是统治者或政府之事,公众事务是历史衍生而来的意思。例如,“枵腹从公”、“力疾从公”、“欺公罔法”的“公”,都是指政府或政府事务。所以官府衙门就是“公家”、“公门”,官服就是“公服”,政府发出的证明叫“公验”、“公凭”,政府的文书叫做“公文”,打官司则是“对簿公堂”。在现代,政府工作人员称为“公务员”。^[9]由此可见,“公”虽然渐渐淡出国君之意,但政府、朝廷或政府事务的含义保留至今。

相比较英文“public”,拉丁文 publicus 是“public”字的先祖,法语和英语的 public 都是同个词,德语为 publikum。在语源上,publicus 是从 populus(人民)变化而来,也许还受到 pubes(成年男子)的影响,意思为“属于人民全体的”、“与人民有关的”、“众人之事”。西方政治中的 republic 与 public 联系紧密,意味着国家事务从君主的家庭私事中解放出来成为处理大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可见,在中西词义对照之下,public 一直带有人民的意味,众人、公众的意味,不同于汉字的“公”以国君朝廷为语源,与“人民”的关系相当疏远稀薄。虽然,“公”在晚清前后发展出普遍、平等、共同、全体的意思,并且在引进西方众多思想与理念时学者们倾向用“公”来理解新事物或支持新思潮,“公”甚至一时成为中国应对西方文明冲击的思想资源之一。例如将西方的选举称做“公举”,西方的议会经常译为“公议堂”、“公议厅”,清末的地方议会的确有叫“公议局”的。然而,我们显然可以发现在政治实践中,“公举”、“公议厅”还是“官家”的场所,“官家”的行为,“少数精英”的行为,缺乏多数人的参与,与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现代民主共和思想有一种深层次的水土不服的矛盾之感。

在中国历史思想语境下,由于“公”是以“国君”、“朝廷”、“统治者”为词源,与权贵阶级、政府权力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关系,与现代民主精神相悖,因此推测中国思想界认为将 public opinion 翻译成为“舆论”更为妥当贴切,这种舆论观念的兴起适应于从传统皇权转向现代民主国家的时代需求,舆论概念的使用消减“公论”所携带的官方倾向与精英色彩,有意识地与少数统治者的意见相区别开来。^[10]将发表意见的主体范围直接扩展到普通民众,舆论比公论显得更加亲民与大众,这一点与20世纪报纸、杂志、电报、无线电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相为呼应,标志着“庶民”的崛起。

四、中国和西方舆论观念的差异

进入20世纪之后,舆论在与多个相似术语的竞争中由隐入显,特别是代替在古代占据较高使用地位的“清议”、“公论”,与新闻、报刊、言论等现代术语并肩雄霸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学及其相关领域。“舆论”一词的品评人物、朝堂之争等传统内涵在时代演变中逐渐淡化、隐藏或被消失,而民心民意、建言献策、监督政府等涵义被持续强化,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与媒体、政治与新闻之间正当性理论的规范基础。

在中西碰撞的历史思想背景下,中国现代舆论观念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西方 public opinion 观念的诸多涵义,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人在20世纪对“舆论”意义的理解完全与西方相同呢?笔者认为,中西舆论观念是有差别的。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引进西方 public opinion 内容时,传统观念潜在地参与了中国现代舆论观念的塑造,这个过程中包含“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重构”两个要素。或者说,这是一个“强制型同化机制”,即采用古老的传统术语的“名”,来表述西方文明之“实”,其结果必然有些名不副实。

西方舆论思想与学术论辩分为两个时期:传统时期与现代时期。传统时期的西方舆论思想本质上是围绕着普通民众是否有能力理性地参与政府的决策与管理这个中心命题,一派以柏拉图、霍布斯、黑格尔、汉密尔顿等为代表,认为缺乏才智的民众不能对国家治理产生贡献。另一派以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杰斐逊等为代表,他们对大众充满信任与赞赏,对人民的集体智慧保持乐观。^[11]现代时期则是进入以社会学、统计学等为理论支撑的民意调查的实证科学阶段。虽然有不同领域的学者对民意

调查为主要形式与内容的舆论研究进行了众多有启发性的批评，但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舆论研究机构产生了大量的调查统计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意见与舆论倾向，整个运作较为成熟规范。

西方舆论观的形成是建立在西方现代性理论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性由三个要素组成：工具理性、个人权利与民族认同。^[12]这三个现代性要素中与舆论观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理性”与“权利”，进而言之，西方舆论观将舆论表达视为一项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舆论表达是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理性力量，是保持政治公正公平的一种力量。西方舆论思想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受到西方传统时期“公民参政议政”舆论思想的影响，对现代中国告别皇权专制、追求民族解放发挥了思想启蒙作用。然而，这种思想启蒙作用没有彻底完成，传统力量对现代启蒙思想进行了“选择吸收与重新建构”。在本文前面给出了“舆论”一词的四种传统含义及意义结构，这些传统含义及意义结构本质上是由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而这些传统的政治要素仍潜在地发挥作用，这正是与西方舆论观出现差异的深层思想结构。传统中国属于家国同构的一元性政治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与传播结构存在着共协关系，一元性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传播体制的一元化格局，皇帝既是政治权力的主宰，又是社会信息的总源和总汇，对社会信息具有绝对的制导权，形成供皇帝与官员交流信息的封闭系统。历代也有注意民意、舆论的机构和制度，但这些制度只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补充，而非一种制衡皇权的独立力量，这种“定于一尊”的一元传播传统在思想深处继续发挥作用。^[13]

历史证明，“定于一尊”的一元传播传统在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兴起的过程中得以重构。持不同政见主张的维新派、革命派等仁人志士在面临如何建立富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命题时，对舆论的认识与思考都首要着眼于国家需要、政治需要，将报刊舆论看成是鼓吹革命、统一思想、发挥喉舌功能的政治工具，与历史惊人相似地形成一套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然而，在大众传播、新兴阶层、西方文明多重要素的共同作用下，舆论思想的兴起与演变还是“不可逆潮流”地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虽然在历次政治变革中，大众传媒无法摆脱附属于政治权力的喉舌命运，但兼有扮演信息沟通、知识传播的社会功能角色的大众传媒，拓展出发挥向导国民、舆论监督、受众市场的理念。第二，在舆论思想的演变过程中，有学者不断引入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视角，侧重于学理逻辑上对“舆论”进行解读，淡化舆论思想中的动员民众的政治功能，扩充舆论的社会内涵，某种程度上为舆论权力获得一定的政治上的安全性，成为现代中国新闻传播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 [1]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5-6
- [2] 辞海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861.
- [3] 王维江．谁是“清流”？——晚清“清流”称谓考 [J]．史林，2005（3）：8-9.
- [4]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6.
- [5] 倪琳．晚清清议向舆论演替的历史动因 [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20.
- [6] 陈国廷．“舆论”究竟是什么？ [J]．留东学报，1936，1（4）：1.
- [7] 徐道鄰．公论与舆论 [J]．世纪评论，1947，1（2）：6.
- [8] 黄钟．舆论广释 [J]．现代周刊，1945，3（2）：9.
- [9] 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 [A] 许纪霖．公共性与公民观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9.
- [10] 倪琳．Public Opinion 译为“舆论”考 [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3（2）：50
- [11] Ferguson, Sherry Devereaux. Researching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M]．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2000: 3-7.
- [12] 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6
- [13] 秦志希．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的若干特性 [A]．孙旭培．华夏传播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6-37.